



| 光明社科文库 |

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

(1927-1937)

刘继忠◎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光明社科文库 |

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

(1927-1937)

刘继忠◎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 / 刘继忠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94-4700-7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国民党—新闻事业
史—研究—1927—1937 IV.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3296 号

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

GUOMINDANG XINWEN SHIYE YANJIU : 1927—1937

著 者：刘继忠

责任编辑：刘兴华

特约编辑：万 胜

责任校对：赵鸣鸣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曹 静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100050

电 话：010-67078251（咨询），63131930(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电话：010-67019571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170mm × 240mm

字 数：506 千字 印张：31.5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4-4700-7

定 价：1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大陆时期国民党新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至今其研究成果仍较为薄弱。199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随我研习中国新闻史的蔡铭泽，穷三年时光专心研究中国国民党党报史，其专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于1998年正式出版。这部弥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一大空白的力作，在较长时间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唯一一部有学术深度的专著，揭开了建国后中国大陆学者关于国民党党报史研究的序幕。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台海关系和缓，“民国热”兴起，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再次受到了学界重视，涌现了一些值得赞许的研究成果。刘继忠博士的《喉舌与训政：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该书是作者在教育部社科基金的支持下，以他的博士论文为主体，历经5年的调整、补充、修改和加工后付梓的，其面貌已大不同于博士论文，可谓是其博士论文的“升级版”。

在中国历史上，国民党是第一个执政的现代政党，国民党南京政权是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新闻事业是第一个由执政党建立、管控的庞大的政党新闻事业。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国民党党治体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是中国新闻界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在当时，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国民党的“训政”思想和“训政”体制的严重影响，新闻事业必须在“训政”的框架下运作，必须受“训政”体制和“训政”思想的制约。两者之间既要协调，也有矛盾，既相契

合，也相抵牾。前者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党营报刊方面，后者主要表现在游离于国民党体制外的一些报刊和纯民营的报刊方面。这是现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时期。

大陆在左倾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对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勾勒的都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反动史”、“罪恶史”的一面。作者另辟蹊径，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国民党新闻事业为何“反动”、为何“罪恶”的层面，细致全面地研究了国民党新闻事业与其训政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呈现出以往被忽略或遮蔽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某些历史新面相。政党新闻业自然要听政党的话，然要达到政党想要的预期效果，必须遵循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服务受众，考虑传播效果。在这方面，国民党新闻事业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案例。它既没有很好地听国民党的话，忠实地、不折不扣地向受众宣传、解读、灌输国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没有获得受众认可，获得市场认同，成为民国社会主流舆论的引导者、塑造者。造成国民党新闻事业成为一个失败案例的因素很多，既有国民党新闻从业者、管理者层面的内部因素，也与国民党新闻统制体系、国民党组织系统、党治训政体制、民国政治文化，乃至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有关，且后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揭示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作者在“喉舌与训政”的政治传播框架内，沿着思想——制度——传媒——实践的路径，从寻绎国民党训政思想的本源，孙中山的训政理论和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开始，条分缕析地描述了国民党的训政思想、党治训政体制与新闻思想的形成历史，全面研究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建构的新闻统制体系与国民党新闻传媒体系，以典型个案的方式考察了国民党新闻业的“训政”传播的策略与新闻实践，回答了国民党新闻事业为何“反动”、为何“罪恶”的问题，深入揭示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喉舌”定位与其训政实践的复杂、多元的矛盾关系，及国民党创办政党新闻业的现实动机与其预期效果的历史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同情之理解”。研究方法上，作者将政治传播学的学理引入新闻传播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方法创新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读本。

作者这部专著征引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特别是现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还借鉴了近年出版的两岸学者的学术著作。这使相关课题研究具备了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使全书的论述和分析，得到有力的支撑。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史料的浩瀚、分散，作者难以做到竭泽而渔，略为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援引现藏台湾及欧美诸国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使本书仍有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某些论断可能因新史料的出现而需要重新斟酌。这是需要新闻史学界特别是本书作者继续努力的。

继忠出生于贫苦农家，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得到新闻学启蒙后，于2007年在京随我研习中国新闻史，更见其为人朴实诚恳、治学刻苦严谨。继忠注重“打深井”，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力求做到言必有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与此同时，他还有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事新闻史的研究。这些都使得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深化了国民党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有助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深入，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不足，是值得欢迎的。

2010年，继忠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继续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南京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当代中国新闻事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在那里研究民国新闻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从事新闻教育和科研工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目前，他参与了国家重大招标课题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科研工作，期待他钩沉探赜，神思飙举，不断有新的著述问世。延跂以待，有厚望焉。

方汉奇

2015年8月28日

序（二）

《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国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府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①而国民党的新闻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执政党建立并管控的庞大的政党新闻业，无论是指导思想、管理体制、实际运作，还是创办初衷与最终效果的反差，都是值得花大气力进行研究的。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对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1998年蔡铭泽出版《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之后，对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台海关系的和缓、大陆政治环境的宽容，对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才陆续有专著问世，主要有：向芬专著《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2012）、赵丽华专著《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2012），贺渊专著《新生命研究》（2011），江沛、纪亚光专著《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倪伟专著《“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9—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2003）等，另有一些博士论文如李煜博士论文《中国广播现代性的流变：国民党广播研究（1928—1949）》（2008）、张莉博士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新闻出版立法研究》（2011）、何秋红博士论文《〈通海新报〉和南通城市》（2015）、王继先博士论文《新闻人马星野研究》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喉舌与训政：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是继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之后，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和党争：1924—1949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修订增补版），2010，第1页。

研究国民党新闻事业史的一部力作。

这部书是作者领衔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作者按照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媒业——新闻传播实践的研究路径，试图解决三大问题，即（1）国民党新闻业的喉舌角色与国民党训政的基本思想、历史框架是如何形成的，经过了哪些演变，孙中山先生在其中作用是什么，内在弊病是什么？（2）在国民党训政的党治框架内，在民国新闻业的媒介生态中，国民党是如何加强其政党新闻业的建设与管制的，国民党建构了什么形态的政党新闻业的历史体系，采取了哪些措施，使其政党新闻业在新闻实践中真正扮演其舆论喉舌的角色的。（3）在国民党的严厉规制下，国民党新闻业秉持何种新闻理念，在新闻实践中又是如何履行其喉舌角色，如何配合国民党党治训政的政治活动的，其传播的社会效果如何，为什么是如此效果。研究指向明确，全书内容集中。

本书作者刘继忠本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2004年考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2007年又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从中国新闻史泰斗方汉奇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样的求学经历使得他不仅有较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而且有较为扎实的新闻史学根基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以《新闻与训政：国统区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毕业后，继续研究，进一步理清思路，思考问题，挖掘了不少有关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档案资料，尤其是现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这部书可以看做是他博士论文主体部分的“升级版”，不仅史料详实，结构完整，而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

首次，在“喉舌与训政”政治传播的框架内全面研究国民党1927—1937的新闻事业史，较为细致地呈现了以往被忽略或遮蔽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某些历史面相，探析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创办初衷与最终结果出现巨大反差的历史原因。

其次，将政治传播的学理引入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切换一个新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视角。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往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阶级斗争史观，论述国民党新闻媒体，要么说它是愚弄人民的“反动史”、钳制言论的“罪恶史”，要么称其为国民党党治框

架下的“正统史”。本书将国民党新闻事业史放在“喉舌与训政”的政治传播的框架内，从国民党本身面临的时代问题出发，从国民党新闻事业形成的指导思想、制度因素切入，结合国民党“训政”政治的最大现实，详细分析了国民党新闻统制体系的形成、新闻媒体体系的形成及基本性质，国民党新闻事业“训政”传播的策略与实践，较为准确地揭示出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历史本质。

其三，在阅读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大量报刊原件，特别是阅读大量报人的传记、文章、回忆录、书信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对史料进行了重新解读，挖掘出其中的新意。在书稿撰写上，将史料征引，事实叙述与论述分析结合起来，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因而本书不仅史料详实，而且颇具思辨性和思想性。

继忠是一个有才华、很勤奋的青年新闻史学者。他说，在我任教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三年是他学习和研究新闻学的“真正启蒙”，后来无论是攻博还是工作期间，都与我有些学术上的交往，对他比较了解。他的新作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欣然应允，因此写了以上的话，是为序。

吴廷俊

2015年9月16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意识及其限定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5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章节架构	14
第四节 基本术语的厘定与说明	17
第二章 孙中山视野中的“喉舌与训政”	19
第一节 孙中山的“训政”思想	20
第二节 孙中山的新闻传播思想	37
第三节 小结：孙中山视野中的“喉舌与训政”	58
第三章 官办教化：国民党训政体制及训政实践.....	60
第一节 权力角逐中党魁要人对三民主义（训政）的阐发	61
第二节 党国体制的建构与制度变迁（1927—1937）	95
第三节 对党国体制及国民党训政行为的评价	108
第四章 权力喉舌：国民党的新闻传播思想.....	111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传播思想的渊源及其共识	112
第二节 国民党党魁的新闻思想——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探讨	129
第三节 国民党新闻人的新闻思想：以马星野、《中外月刊》为中心的 探讨	144
第四节 国民党新闻传播思想的历史评析	171

第五章 制度管控：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的形成及特点（1927—1937）	176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的历史形成（1927—1937）	177
第二节 国民党新闻管理的行政科层体系	188
第三节 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的基本特征	198
第六章 国民党传媒体系的形成及特点（1927—1937）	210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传媒体系的基础与建设	211
第二节 国民党新闻传媒业的形成历程	215
第三节 国民党党营传媒业的基本特征（1927—1937）	237
第七章 国民党“训政”传播策略与实践（上）	266
第一节 意识形态塑造：纪念仪式传播策略与实践	266
第二节 党国政策的灌输与辩护：“攘外安内”的报道分析	289
第八章 国民党“训政”传播策略与实践（下）	302
第一节 派系争斗：“拥蒋”与“反蒋”间的宣传战	302
第二节 “剿共”战争：“污名化”中共的宣传	316
第三节 爱国民族主义：应付“日本侵华”的国内外宣传	336
第九章 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历史沉思	361
第一节 党国传媒的受众认知与传播效果	362
第二节 国民党败退大陆的种子：新闻传播学的点滴思考	372
参考文献	382
附录	415
后记	48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及其限定

政党新闻业与政党息息相关是20世纪中外新闻史上的重要现象。在中国新闻史上，国民党新闻事业与国民党、国民党南京政权息息相关，三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未完成类似欧美诸国政党与政党新闻业之间关系的历史蜕变：政党新闻业虽然衰落，政党却依然坚挺，且能有效引领主流舆论。原因何在？目前尚未见有见地、有深度的历史分析。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传媒与政党（政府）的关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相关理论成果相当丰硕，但对于民国时期国民党传媒与国民党的关系研究，目前依然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党新闻史研究较为薄弱，尚未摆脱阶级史观，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要么是愚弄人民的“反动史”、钳制言论的“罪恶史”，要么是国民党党治框架下的“正统史”。同一段历史，差距却如此之大！历史研究何时、如何才能摆脱来自“政治正确”的无形束缚？

随着民国的渐去渐远，台海关系的和缓，大陆政治环境的宽松，客观、全面、公允地研究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学术环境渐趋形成。2013年，“中华民国新闻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些反共的报人、报刊的研究成果陆续得以出版。这些事实表明，客观、全面揭示被旧意识形态迷雾遮蔽的历史真相的研究时机已经成熟。在此背景下，本书作者主持的“喉舌与训政：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列入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本书亦是该课题的最终结项成果。

“喉舌与训政：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项目是在本书作者博士论文《新闻与训政：国统区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主体部分的基础上，

针对大陆国民党新闻史研究建构的革命史范式下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反动史”、“罪恶史”，未深究国民党新闻事业为何“反动”、为何“罪恶”的深层次的历史根源，未深入探讨国民党新闻业的“喉舌”角色与其“训政”实践的互动关系，未能深入揭示国民党新闻业“动机”与“效果”之间的矛盾关系，未能有效彰显国民党新闻事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正面、积极的历史作用等研究薄弱环节而设计。研究目的是在客观、公允地总结国民党新闻事业——这部包含丰富历史意蕴的反面教材——的基础上，探究国民党败退大陆的新闻传播学根源，为执政党科学地管理新闻事业，有效把握舆论导向等问题提供历史镜鉴。

然而，当将国民党庞大的新闻事业、新闻统制体制放在“喉舌与训政”框架内予以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审视时，所涉及的问题绝非本项目即本书所能完全胜任。基于此，也为了避免研究中不够深入、蜻蜓点水的弊病，本书将之简化为三大问题单。一是国民党新闻业的喉舌角色与国民党训政的基本思想、历史框架是如何形成的？经过了哪些演变？孙中山先生在其中作用是什么？内在弊病是什么？二是在国民党训政的党治框架内，在民国新闻业的媒介生态中，国民党是如何加强其政党新闻业的建设与管制的？国民党建构了什么形态的政党新闻业的历史体系，采取了哪些措施，使其政党新闻业在新闻实践中真正扮演舆论喉舌的角色的？三、在国民党的严厉规制下，国民党新闻业秉持何种新闻理念？在新闻实践中又是如何履行其喉舌角色、如何配合国民党党治训政的政治活动的？其传播的社会效果如何？为什么是如此效果？在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单的过程中，客观、公允地评价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作为，探究国民党败退大陆的新闻传播学根源，总结社会转型时期传媒与政治达到良性互动的基本规律，以资今鉴。

国民党宣称的训政始于1928年二届五中全会，形式上结束于1948年5月的国民大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共施行18年。本书之所以选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所谓“黄金十年”，主要在于：一是这一时期是国民党施行“训政”的最佳历史时期，也是国民党“训政”的主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国民党庞大的党营新闻业的重要形成期，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8年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的8年间，国民党基本延续了前10年的“训政”思维与模式，且主要政治行为是

抗日战争与国共全面内战。因而抗日战争爆发的前10年是在“喉舌与训政”框架内研究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最佳历史时期。二是由于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庞大，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复杂与多变，将后者包揽进去，固然能全面审视国民党的新闻事业，也因其繁重的工作量，易使研究陷入难以深入的弊病，故只能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弥补。

在中国历史上，国民党是第一个执政的现代政党，国民党南京政权是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国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① 国民党新闻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执政党建立并管控的、庞大的政党新闻业。“三个第一”在同一历史时期息息相关、共存亡的历史关系，蕴含了深邃的历史意蕴与启示。

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第一个党治政权建立的第一个庞大的政党新闻业和第一个庞大的新闻管理体制，其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第一个标本，且是一个失败的标本，其蕴含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与牢记。

二是在中国首个党国体制下，初步完成近代化转型后的新闻业与政治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互动冲突。这场大规模的互动冲突内含了近代传媒言论自由的现实追求与人治社会的巨大反差，新闻人对传媒角色、功能的自我预期设定与政治权威的现实制约之间的巨大冲突，知识分子（含新闻人）“言论报国”的志趣与未上轨道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三条相互交织的巨大矛盾。而这些矛盾及由矛盾支配的新闻业与政治的冲突又交融在以“救亡图存”为时代主题，传统帝国向现代化民族国家“被迫现代化”^② 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国民党新闻业裹挟在这场大规模的互动冲突之中，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故通过国民党新闻业管窥这场大规模的互动冲突，总结其经验教训，能为理顺中国的新闻传媒业与政治的合理边界与各自权责提供宝贵、难得的历史镜鉴。

三是1927—1937年间的新闻业与国民党“训政”政治的互动冲突，可谓是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2010，第1页。

^② 陶东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出来的。这一被迫现代化的事实，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大的国情”。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6页。

中国政治新闻传播史上最为精细、复杂、多元的时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传统中国，邸报是政府统驭民众、传达政令的工具，根本没有对抗专制统治的资本，无所谓冲突与对抗（文字狱发生的主要领域是书籍）；晚清时期，近代新闻人初登政治舞台，获得了与皇权抗衡的社会资本，在“改良”、“革命”的社会运动中，展开了与晚清政府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由于晚清政府主要延续传统镇压方式应对近代传媒的舆论围攻（后期虽制定了有近代意义的《大清报律》等出版法，却流于形式），使近代新闻业与政治的交锋显得残酷、野蛮。北洋时期，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失序，使近代新闻业与军阀政治发生第二次正面冲突：报人地位的提高，自由体制的确立，民主宪政等观念的盛行，让新闻业拥有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自我想象，但职业行为的不成熟、军阀的武功迷恋，使这一时期的新闻业与政治的冲突整体上仍处在正面对抗状态。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召集记者的训词“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①”的思维和做法，是各派军阀对付新闻人的典型缩影。到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统治的第一个10年期，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新闻业与新闻统制体制，国民党党政要员熟稔新闻宣传，有着丰富的新闻宣传经验，新闻业界本身是政党、民营、外国在华等多种业态的并存，自由主义理念、新闻业的经济基础、舆论影响力、传媒业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均获得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国民党为巩固一党统治，应对内忧外患，强化了新闻控制与言论一律，新闻业与政治的互动冲突更为精细、现代。国民党党营传媒业在其中的矛盾、作为、表现，亦是值得探究的一道历史风景。

四是在“宣传威力至上”的社会环境下，在党治框架内的新闻业与“训政”政治的互动冲突，最终以史实上的“两败俱伤”划上历史句号：旧中国新闻媒介的运行模式与观念系统终结，国民党南京政府失去了大陆政权。因此，研究这一历史结局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从新闻传播学视野理解国民党为何在短短20余年内就败退大陆，有助于思考党治体制下的社会全面转型，其政党新闻业实际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与功能，有助于思考在党治体制下的社会转型，该如何确立科学、合理的新闻业界的言说边界，也有助

^① 原文为“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第208页。

于思考党治体制下的政党（政府）该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新闻业，使新闻业有效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基于此，本书以“三大问题单”为导向，在喉舌与训政的框架内，在新闻业与训政政治的互动冲突的历史背景下，沿着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媒业——新闻传播实践的路径，研究1927—1937年的国民党新闻事业，以期探求其中的历史智慧。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受正统史观的影响，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始终未摆脱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时代思潮的左右，在史事选择、史实解释与评价上未逃脱“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且有意无意地渗透了过多的非学术成分，许多事实甚至被长期遮蔽。又因新闻业本身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涉事项庞杂多蔓，加之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庞大及国民党新闻业与其政党、政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文献分散在新闻史、民国史、国民党史、政治史、文学史等多个学术领域，其研究文献虽不如中国近现代民营新闻业、红色新闻业丰厚，但累积至今也是数量不少，可供后来者参考。国民党新闻事业断代史（1927—1937）的研究史亦是如此。本研究希望在能力范围内，搜尽各种可能的相关资料，吸收、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增益本研究的历史厚度。然就目前本人的学术视野所及的范围，已有相当多的材料可资取用，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会进一步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因此，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不可能完全穷尽，择其紧要列举，评述研究得失，勾勒整体面貌、提炼典型特征为较佳选择。

在综述前，需说明两点：一是国民党新闻事业（1927—1937）的研究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断代史至今虽有近百年的研究史，其研究却被历史潮流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切割为两大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年前的研究是历史当事人、旁观者、研究者对国民党新闻业的经验认知，其成果已是历史文献。它自成体系，分布广泛，与国民党新闻事业处于同一历史时态，其文献具有第一手史料的重要价值。1949年后的研究

因历史原因主要形成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两大学术地理群体。由于国民党新闻事业以“反面历史教材”的身份退出大陆历史舞台，故中国大陆的研究文献虽有总体否定的“败寇”思维，却也有完全不受国民党意识形态束缚的优势。与之相反，中国台湾地区虽承继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历史衣钵，有许多国民党新闻业的历史创建者、见证者参与，其研究文献仍带有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至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仍未彻底摆脱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余绪。二是“喉舌与训政”框架内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是从政治传播视野内而非新闻本体视角审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断代史，故民国政治史、国民党党史中的一些研究文献亦在本研究的参考范围内。

1949年前，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与新闻业本身发展几乎同步，相关研究文献基本是期刊文章、报刊报道及国民党各级宣传部门的工作文件等，未有学术色彩的专著存世。研究者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党人在民国新闻业范畴内对其党营新闻业、新闻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探讨，^①主要包括国民党内主管宣传工作或有着丰富宣传经验的国民党高层官员，如陈布雷、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具体负责管理民国传媒业的国民党宣传系统、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部的负责人或其工作人员，国民党党营传媒的社长、总编辑及一般新闻工作者，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的教员、学生等，他们基本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理论辩护者、经验总结者、政策诠释者。刊发阵地主要有《江苏月报·江苏新闻事业专号》（《江苏月报》1934年1月1卷3期）、《中外月刊》“新闻界”专栏（1935年12月—1937年6月）、《前途·新闻统制专号》（1936年4卷9期）、《汗血月刊·出版事业专号》（1935年7月）等国民党党刊出版的专号和专栏，《中山教育馆季刊》、《留东学报》等国民党党刊及国民党党报出版的诸如《绍兴民国日报元旦特刊》（1930）、《宁波民国日报六周年纪念暨二十年国庆纪念合刊》（1931）等纪念专刊、特刊等，此外，黄天鹏主编的系列新闻期刊、《十年：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等民营

^①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具有管理民国新闻事业的合法性，国民党人亦将之作为新闻叙述的“不言自明”的基本前提，其新闻业的话语叙述对象不是单一的国民党新闻事业，而是党治体制内的所有新闻业态，即用“中国新闻事业”而非“国民党新闻事业”一词指代以国民党新闻事业为主体、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合法”民营新闻业、在华外人新闻业及南京政权打压的“非法”新闻业为补充的民国新闻业。